



# 器之藏

黄爱梅 于凯 著

——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上古文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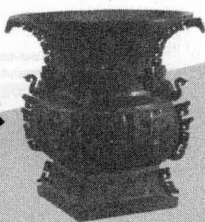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试图用现代考古学证明，

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，

是上古时期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既独立发展、

又交流融合的漫长过程的产物。

上海教育出版社  
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

# 器之藏

黄爱梅 于凯 著

——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上古文明

我们试图用现代考古学证明，  
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，  
是上古时期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既独立发展，  
又交流融合的漫长过程的产物。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  
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器之藏: 考古视野下的中华古文明 / 黄爱梅, 于凯著.  
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4. 12

ISBN 7-5320-9734-X

I. 器... II. ①黄... ②于... III. 文物—考古—中国—旧石器时代~周代 IV. K8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6935 号

## 器之藏

——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上古文明

黄爱梅 于 凯 著

出版发行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易文网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永福路 123 号

邮编: 200031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

印张 13.75

插页 2

字数 210,000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 本

ISBN 7-5320-9734-X/I·0058

定价: 25.00 元

# 序

“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”《古诗十九首》中一位无名作者的喟叹，道出了短暂人生与沧桑世事间的强烈反差。生命苦短，时光漫长，有限与无限，是人类不能不面对的永难消解的基本矛盾。

时光的流转，带走了一个个有限的生命个体和他的经历，同时也沉淀下众多的历史遗存，就像树木生长留下的年轮。这些遗存，记录着宏阔时空中人类演化历史的点点足迹，同时也指示着人类文明的来路与去路。

人类进化的路程长途漫漫，而“文明”的产生，只有短短的几千年，但这“文明”却是长达数百万年人类进化的智慧的结晶，是人类自身状态的“升华”。从此，人类最终摆脱了无知与蒙昧，开启了创造自身历史的大门。

在人类历史上，曾有过众多的文明形态。时至今日，有些已经消失，有的还在延续，但不论最终命运如何，它们都像汇成江河大海的涓涓细流，为人类的进步，各自做出了独特的贡献。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，离不开这众多文明的汇聚、交融和冲突；今日的世界如此精彩，也同样有赖于众多文明要素的融聚之功。

中华文明，是人类历史上的早期原生型文明之一，她与古巴比伦、古埃及、古印度等，并称世界“四大古代文明”。同时，她又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、影响人口最多的文明形态。

她历经几千年沧桑而本色不改、屡遭磨难而活力不减，兼容并包又含蓄稳健。她传布地域广、影响范围大，惠及亚洲和世界各地，不仅是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精神汇聚之所在，更是当今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根基如此深厚，生命如此顽强，在世界文明史上，实为仅见。

面对祖先创造的辉煌文明，每个中国人都深感自豪与骄傲，同时也满怀好奇与求知的渴望：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？她是如何诞生并发展到今天的？她拥有怎样的特殊性格？对人类历史产生过那些重大影响？她的前途命运将会如何？……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，都隐藏在千曲百回的历史深处，吸引着我们去寻根探源。

要追溯中华文明的源起及演变历史，单靠传世文献的记载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因为上古历史，微茫难求，时代越是久远，文献记载的空白就越多。只有现代考古学，才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双穿透漫长时空隧道的“慧眼”，使我们从祖先留下的种种古代遗存所提示的“蛛丝马迹”，透见中华古文明的具体演进历程。

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小书，就是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，对中国古文明，特别是从远古到夏、商、周“三代”时期文明的一次“寻根”之旅。我们希望能与读者一道，沿着祖先留下的远古遗迹，回溯往古，走进这一古老文明的深处，共同感受她的生长历程，领会她留给我们的深厚魅力。

我们希望，这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，同时也是沿浩荡历史长河，对民族之源文化之根的叩问和追寻。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--

### 序

---

#### 叩开国史之门

---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面对传说       | 2  |
| 从“信古”到“疑古” | 5  |
| 重修国史       | 9  |
| 释读“天书”     | 12 |

#### 我们的远古祖先

---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从“曙猿”到“古猿”  | 16 |
| 探访“北京人”     | 20 |
| 我们的远古祖先     | 25 |
| 中国人有个非洲老祖母吗 | 33 |

#### 灿烂星河

---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次产业革命   | 38 |
| 绚烂彩陶      | 44 |
| 八千年前的村落   | 50 |
| 埋藏七千年的秘密  | 54 |
| 母性的温柔     | 60 |
| 乘巫之风，向美而翔 | 65 |
| 灿烂星河      | 71 |

#### 文明曙光

---

|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|
| 西山残照 | 76 |
| 大汶口  | 80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红山之巅，女神之所 | 84  |
| 高台上的神祇    | 88  |
| 城：社会的中心   | 94  |
| 王者之气      | 99  |
| 铜器和文字的诞生  | 103 |
| 万川归海      | 109 |

## “三代”寻踪

---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两位“老祖宗” | 118 |
| 夏文明之谜   | 128 |
| 商邑翼翼    | 134 |
| 周庙奕奕    | 146 |

## 器以藏礼

---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九鼎传说    | 156 |
| 鼎食钟鸣    | 159 |
| 纹饰背后的秘密 | 166 |
| 器以藏礼    | 171 |
| 剑戈幽光    | 175 |

## 文以观史

---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甲骨上的档案  | 180 |
| 献给祖先的文字 | 184 |
| 战国简帛文   | 188 |

## “中国”与“四方”

---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中国”与“四方”   | 192 |
| “三代”时期的周边文化 | 194 |
| 汇聚、交融与释放    | 201 |

## 结 语

---

## 后 记

---



## 叩开国史之门

一个世纪以来，  
现代考古学的引入与发展，  
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穿透历史时空的大门。  
远古洪荒以来中华大地上的种种人类活动，  
都已有所发现；  
古代中华文明的面貌，  
再也不是一片虚无飘渺的空白了。



## 面对传说

旧时戏文，常用“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”开篇，说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遥远与绵长；今日，人们也常用“博大精深”、“源远流长”等词语，来形容她的深邃与久远。钱穆著《国史大纲》，将中国视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。他以为，中国历史有“悠久”、“无间断”、“记载详密”的特点，而且“中国所包含地域最广大，所含民族最复杂”，因此，“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，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，则我华夏文化，于并世故当首屈一指。”

钱穆的自豪，是有理由的。

中国的古史传说相当发达，有“开天辟地”的盘古，有“抔土造人”的女娲，有观象取物以作“八卦”的伏羲，有筑巢树上的“有巢氏”，有钻木取火的“燧人氏”，有遍尝百草的神农、创制百物的黄帝、治水的大禹、禅让的尧舜，也有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（商人始祖）、姜嫄履大人迹而生稷（周人始祖）……神神怪怪，林林总总，算得上异彩纷呈。

这些古史传说，零散地保存在许多古代典籍之中。如先秦典籍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，就有不少上古历史传说的零星记载；战国时屈原作《天问》，问遍当时所知天地古今各类知识，也有某些上古历史传说的影子；《大戴礼记》中有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，据

说是孔子传授给弟子宰予的上古帝王谱系之学；还有《山海经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淮南子》等书，也记载了许多与早期历史相关的神话传说。最近公布的《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》，有一篇叫做《容成氏》的作品，记载了从“容成氏”到西周时期的若干古代帝王事迹，也提到了一些我们今天不太熟悉的上古历史传说。

但这些古史传说存在着“先天的缺陷”。一是其中的人和事，往往带有某些“神迹”，与神话难以区分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当作信史，一直令人困惑。二是多数古史传说，往往是片言只语、其说不详，单凭文献的记载，几乎没有办法去复原或验证它们。

早在春秋之时，孔子要探究夏、殷两代的历史，就有了“文献不足徵”的喟叹；到西汉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立志“究天人之纪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但他也只能以“黄帝”为开篇。在他看来，黄帝以前的古史，都是些“文不雅训”的“百家之言”和“缙绅先生难言之”的怪异传说，即便自己游历四方、遍览群籍，也很难找到可信的标准，所以只好付诸阙如。

学问见识广博如孔子、司马迁者，尚且如此，后人要探寻中国上古历史真相的难度，可想而知了。

以今人的眼光来看，中国古史上的种种传说，的确有许多现代人难以置信的怪诞乖戾之处，而且很多传说往往还会有不同“版本”，即便是同一件事同一个人，也常常言人人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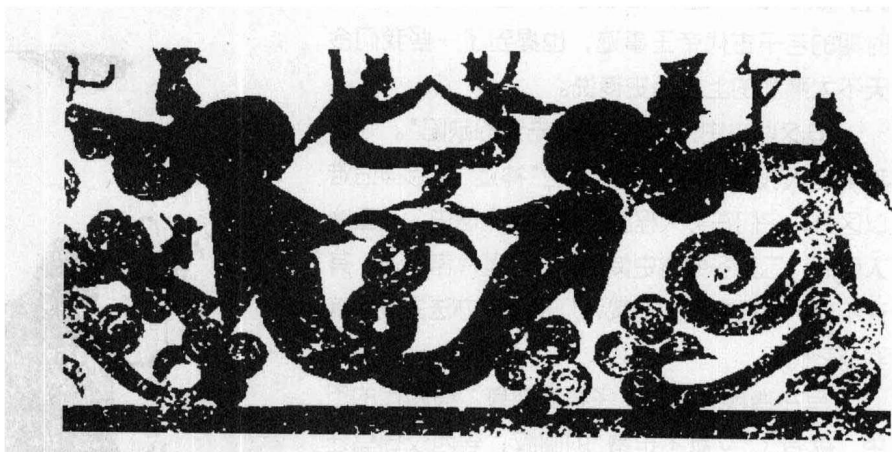
但古史传说决非“空穴来风”。在它荒诞不经的外表之下，往往隐藏着极为宝贵的真实历史内核，蕴涵着古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童年期历史真实的



神农尝百草图。神农氏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远古帝王，相传曾亲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疾病，教导人民做耒耜以发展农业。

某种朦胧记忆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能否找到一种科学方法，让我们洞见古史传说之下中华古代文明的真实本色？

解决了这个问题，钱穆的自豪才会有充足的理由。



汉画像砖上的伏羲、女娲。画面上两人人面蛇身，伏羲持矩，女娲持规。相传他们是人类的始祖，兄妹成婚而繁衍人类。

能否找到一种科学方法，让我们  
洞见古史传说中中华古代文明  
的真实本色

# 从“信古” 到“疑古”

人们对于上古历史的主流态度，不外乎“信古”与“疑古”两种。

所谓“信古”，是指以古代经书（如“十三经”）与史书（如“二十四史”）为万古不变的信条，对其中记载的古史传说，全盘接受、不容怀疑，将“非圣”“疑史”视为“大逆不道”。数千年来，“信古”一直都是国人看待中国古史的主流观点。直到20世纪初，一提“上古”，人们脑海里首先想到的，还是古书中记载的伏羲、神农、炎帝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等“三皇五帝”与“三代圣王”。

在“信古”者看来，古史传说中的上古圣王，往往都是有某种神迹的“历史偶像”。上古时代是炎黄尧舜禹等古代圣王的天下，自然也就是“天下为公”的“大同之世”，是人人向往的“清明盛世”。由此形成了两个基本判断：一是“是古非今”——时代越古，社会越清明，人心也就越纯正；二是“天下大一统”——整个上古历史，总是以中原汉族为唯一的正统，周边其他地区与民族，都是可有可无的“陪衬”。

“信古”的对立面，是“疑古”。

“疑古”之论早已有之，但“疑古”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，却是清末以来的事情。近代中国时势变迁，将传统的“天朝帝国”、“四海一家”的天下观念击得粉碎，以前深信不疑的“经”书所载，也开始遭到一些人的质疑。就清末“疑古”而言，有崔述《考信录》在前，康有为《新学伪

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在后，将许多往日被奉为圣典的古代“经”书，看成西汉末年王莽、刘歆之流为篡权目的而伪造出来的“伪经”。此论一出，举世哗然，许多人读后“如触雷电”（梁启超语）。近代“疑古”思潮的“序幕”，由此揭开。

进入20世纪，“疑古”观念逐渐发展成一项声势浩荡的“历史反思”运动。以钱玄同、胡适、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“古史辨”派学者，主张对古书成书年代及其内容，进行系统“清理”。特别是顾颉刚，他从孟姜女等民间故事的流传中得到启发，将民俗学观点运用到古史研究上来，提出了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”观，将中国古史传说归结为后人系统造伪的结果，从而奠定了现代“疑古”观的理论基础。

顾颉刚认为，中国古代以伏羲、炎、黄、尧、舜、禹等圣王为核心的传说，如同民间故事的形成一样，时代出现得越晚，内容就越丰富，所以整个古史传说体系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，而是历代人不断“造伪”的产物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“层累地造成古史说”的问世，海内外反响强烈。此后疑古之风日甚，学者们先是怀疑古书，既而怀疑旧有古史体系；传统古史研究的方向和思路，都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“疑古”观念彻底打破了“上古大同世界”的传统看法，将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历史观冲击得七零八落，为国人冲破封建思想束缚，引进西方近代史学体系，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前提，其进步意义自不待言。

但疑古过头，也会有“副作用”。“古史辨”派在疑古时，往往“攻其一点，不计其余”，因此他们对古史的怀疑，逐渐从疑“经籍”到疑人、疑事，有一种极端看法甚至认为，现在流传下来的汉以前的所有古书，统统都是“后人故意造伪”的产物，一点也靠不住，我们讲中国历史，最多只能从东周开始。一切都成了“怀疑”对象，不免会使人陷于“迷茫”；而“冤假错案”的出现，也就难以避免了。

按照“疑古派”的这种思路，不仅炎、黄二帝的传说不可信，就连古文献中治水的大禹，也变成了“虚无缥缈”的神灵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古史传说的合理“质素”或“核心”，也就被完全取消，中国上古史从中间被“拦腰砍断”，变得毫无着落和根基。既然古代无史可讲，那么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上古文明和文化源流，更是无从谈起了。后代的历史，也仿佛是突然从

石缝中蹦出来的，既无来路，也无去向。

就在“信古”、“疑古”各执一辞、激烈争辩之时，又有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，借助着西方强势文化传入国内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古史的问题越来越复杂，就连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，也成了问题。

清末民初之际，是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最为流行的时代。有人认为，中国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类似，所以古代中国人应该是埃及人的苗裔；也有人以为中国文化应该来自中亚或印度地区，是这些地方的某一支古代部族迁入的结果。1894年，英国人拉克伯里在《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》一书中，提出了中国人是古巴比伦东迁者后代的观点，这成为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的流行看法。

种种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，虽然具体观点各异，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：它们都认为，中国的最早居民及其早期文明，是西方文化向东土传播和渗透的结果，而非中国本土人群所创造。

今天看来，这些说法似是而非、大谬不然，但在当时，却因为都有着貌似科学的外表，很容易为人轻信。再加上很多中国学者不断鼓吹，加以称述，进一步扩大了它们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影响。

明，更难摆脱穿凿附会的嫌疑。

于是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感到，要彻底解决这一难题，必须依靠新方法和新资料才成。单靠文献记载或想当然的臆测，对澄清问题，是无济于事的。

种种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，虽然具体观点各异，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。

# Chong Xiu Guo Shi

## 「重修国史」

“疑古”思潮的出现，打破了“自古天下一统”观，启发了人们对旧有古史系统的怀疑精神；西方学术和“文化西来说”的传布，则对传统的“中国优越论”施以沉重打击，同时也激发出了国人探究民族文化之源的热情。

差不多就在此时，西方近代考古学方法，也随着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的探险和考古活动，悄然传入中国，并最终催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。

第一位用近代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国史前历史的，是瑞典科学家安特生。

安特生是北洋政府农商部聘请的矿政顾问。任职期间，他对中国新石器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920年，他发表了《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》一文；1921年，他又在河南仰韶主持了中国境内新石器遗址的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。安特生的学术活动，为考古学方法引进中国，做出了贡献。



李济（1896~1979）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早期拓荒者之一，曾先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、安阳殷墟和山东龙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。

1926年，中国学者李济独立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，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，是中国现代考



国学大师王国维(1877~1927)。他提出了著名的“二重证据”法,主张研究古史要立足于将传世文献资料和地下新出土资料相对照,为中国古史研究开创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。

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。身逢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时的中国考古学,从她诞生之日起,就注定要承担起探究民族之本、文化之源的历史任务。

同样是在1920年代,还有一些新声音在传扬。

1925年,王国维为清华大学暑期留校生作了一场题为《最近二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》的演讲,他指出:历代学术史上新潮流的产生,常常是由新发现而起。他列举了历史上古器物图籍的四次重大“发现”在推进学术研究方面的巨大影响,提出“与其打倒什么,不如建立什么”的口号。也是在这次演讲中,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“二重证据法”,强调古史研究,要地下新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资料的并重。他的演讲,不仅是对“古史辨”派疑古过甚的负面后果的反思,同时也是一个信号——它表明,一些严肃的古史学者,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利用新出土资料,尝试重建科学可信的中国古史系统。

1929年,何炳松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《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》一文,提出要用“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”,解决中国“民族起源之问题”的观点,标志着中国文化“本土”说与“西来”说争论的“终结”。

考古学的介入,为我们探寻中国上古文明的真相,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。因为大量事实已表明,研究中华文化起源,单靠文献记载,是无济于事的;最终结论的形成,必须以确定的实物发现为依据。只有跳出千年循环的“旧传统”,才能获得前人未见的“新视野”。

1928年底,由中国学者组成的第一个专业性考古组织—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考古组成立,所长傅斯年随即提出:“修国史”要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,将探寻中国上古历史真相